

儒法斗争史简介（讲稿）

（供内部学习参考）

（2）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一九七四年七月

第 二 讲

两汉时期的儒法斗争

地主阶级统治者由尊法反儒向尊儒反法的转化

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沒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間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剧烈的阶级搏斗，是变革与反变革，进步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到了两汉时期，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地主阶级统治者逐渐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

(1) 地主阶级统治者是怎样和为什么由尊法反儒向尊儒反法转化的？

有一种尊儒反法的观点，认为法家是儒家的继承者，抹煞儒法斗争的阶级对立、路线对立，宣扬儒法两家到了两汉时期就合流了。这就是“儒法合流论”。中国的反动资产阶级学者这样讲，苏修叛徒们也叫嚷什么儒法两派“追求同一目的”。所有这些论调，都抹煞了政治思想领域中儒法两家旧和新、倒退和前进、复古和革新的界限，从根本上否认儒法斗争是政治思想领域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是完全错误的唯心主义观点。

与这种反动论调完全相反，两汉时期的儒法斗争，是尖锐的政治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这个时期地主阶级统治者

由尊法反儒向尊儒反法轉化，是当时儒法两条路綫斗争的一个特点，它是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反映。

两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怎样的呢？

汉承秦制。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秦汉时期的社会矛盾，有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有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分裂割据的矛盾；在民族矛盾上，还有当时匈奴入侵同汉民族抗拒匈奴的矛盾。两汉时期的儒法斗争就是在这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大体说来，这个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些社会矛盾采取以下的对立的态度：

1. 法家主张坚决打击没落奴隶主的复辟势力，展开反复辟的斗争；儒家相反，主张维护没落奴隶主复辟势力，搞反革命复辟活动；

2. 法家维护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削弱和反对地方分裂割据。儒家相反，主张地方分封割据，反对统一的中央集权；

3. 法家坚决主张抗拒匈奴，反对投降。儒家相反，主张屈膝投降，反对抗战。

西汉前期的地主阶级统治者，有七个皇帝，就是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和宣帝。由于当时地主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这些皇帝都是法家，在基本上都采取了法家的路綫，对待当时社会矛盾的态度，都是站在法家一边，反对儒家的。

刘邦是一个大法家。他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他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经过秦末“楚汉战争”，他战胜了以项羽为首的搞分封割据的复辟势力，重新统一中国。

刘邦原来的力量同项羽比较起来是弱的。他只有十万人，项羽有四十万人。但因为刘邦主张进步的统一，反对反动的分裂，路线正确，适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终于转弱为强，取得了胜利。刘邦建立汉朝后，他就成为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代表，继续实行由秦始皇开创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度，基本上采用了秦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历代都行秦政法。汉高祖就是推行秦政法的第一个皇帝。在政治方面，他基本上实行郡县制度，虽然他在楚汉战争时期，为了争取一些军事集团的支持，也承认了一些诸侯王，但在以后他粉碎了韩信、彭越等六个诸侯王的叛乱，并对其他的诸侯王采取了各种办法削弱他们的权力，把部分政权和军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他不喜欢儒生，认为治理天下哪里需要腐儒。有一个名叫酈食其的人要求见他，他当时正在洗足，一听说来的是穿儒服的人，就说：“我正忙着统一天下，不见儒生”。继续洗足，酈食其听后说，我不是儒生，而是高阳酒徒，才准入见，但仍然无礼，酈食其责备他，你对长者怎么这样无礼，你究竟想不想得天下。刘邦想他是为了帮助自己统一天下的，然后刘邦才礼遇。他给刘邦提了许多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建议。刘邦反对儒家的礼治，崇尚法治。他叫丞相肖何整理了秦朝的法律，制定了“汉律”，用以镇压奴隶主残余势力，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和发展封建经济。

刘邦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天下，她主要执行法家路线，继续执行汉高祖的路线。

汉文帝是刘邦的儿子，他“好刑名之言”。主张用法治维

护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那个时候，諸侯王割据势力虽然受到刘邦的限制，但力量仍很强，同中央政权存在尖锐的矛盾。法家賈誼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分裂势力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严重危害性，尖锐地指出，当时中央和諸侯王的关系就象一个人得了手足肿胀病一样，小腿差不多象腰那样大，一个指头差不多象大腿一样大，如果不立即医治，就要成为不治之症。那么怎样解决呢？他建議，“众建諸侯而少其力”，就是使大的王国分成許多小的王国，縮小他們的封地，削弱他們的权力，这样就能保証中央政权統治全国，“就好象一个人指使手臂，手臂指使手指一样，沒有不敢不服从的”。汉文帝采取了賈誼的建議，初步实行了削弱諸侯王势力。

汉文帝和賈誼在防御匈奴方面，主张主动打击匈奴的侵略，实行“募兵备边”的政策，移民充实边境，屯田筑城，增加粮食儲备，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促进封建經濟的发展。

賈誼曾写过《过秦論》，总结秦統一六国又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訓。“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內”。他肯定秦自秦孝公、商鞅以来六个朝代在基本上执行法家路綫的进步作用，而秦始皇正是繼承和发揚了这条路綫，所以統一了六国，并北击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但是他沒有认识到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一場鎮压复辟势力的重大措施，而把它看成是“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并把秦灭亡的原因說成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些是打着儒家的旗号，反对秦始皇，这些都是錯誤的。他罵秦始皇，而且罵得很厉害，但賈誼的整个思想的主流，他的对内对外政策是法家的。打着儒家的旗号，干着法家的事情，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我們要看他的言論和行动的主要方面，要全面看，不要只看一方面。

汉景帝是汉文帝的儿子。“不任儒”，主张法治，以吏为

师，“夫吏者，民之师也”。当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地方割据势力即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博士、御史大夫（副丞相）晁錯，是个著名的法家，繼承賈誼的思想，向景帝提出了“削藩”的建議，削弱諸侯王的封地，特別是打击阴謀叛乱的吳王濞。这个建議被景帝采納了。于是諸侯王对晁錯进行恶毒的攻击。晁錯父亲听到后，从家乡赶来，对他說：“你打击諸侯王，使皇帝和他的兄弟亲属疏远了，你自己也遭到怨恨，甚至晁氏一家都要被你連累，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晁錯回答說：“不如此，天子不尊”，意思是說，不这样干，中央集权制度不能巩固。他的父亲說：“我不忍看到全家遭祸”，回家便自杀了。但晁錯毫不动摇，坚持了坚定的法家立場。不久吳王濞联合其他六个王以“請誅晁錯，清君側”为名，发动七国之乱，妄图夺取皇位。景帝用大将周亚夫迅速平定了叛乱，周亚夫严格治兵，搞了个細柳营（长安之西）皇帝都得按軍規办事。景帝称赞他“老將軍”。景帝并把諸侯王官吏任免权完全收归中央，王国的行政完全由中央任免的官吏处理，中央集权走向巩固。汉景帝和晁錯都主张坚决抗击匈奴，加强守备。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的儿子，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坚持了法家路綫。

一、繼續打击割据势力，加强統一的中央集权制度。諸侯王的势力經過文景时期的打击，虽然已經大大削弱，但仍有一定的力量，繼續和中央政府对抗。针对这种情况，汉武帝頒行“推恩法”，就是以“推恩”为名，下令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繼承王位外，其余子弟也能分割封国一部分土地为列侯，这些列侯归郡統轄，这样王国越分越小，中央的郡县日益扩大，割据威胁就逐漸消除了。

二、改革財政制度，打击奴隶制残余势力。汉武帝改革財政

經濟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抗拒匈奴，同时也是为了“重农抑商”，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他严禁郡国和私人鑄錢，一律由政府鑄錢，又把过去被地方割据势力和大商人控制的盐、鉄、酒等重要手工业归国家专营，沉重打击了富商大賈，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經濟实力。

三、坚决反击匈奴奴隶主貴族的侵扰。武帝时，如何对待匈奴的問題，儒法之間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儒生狄山主张对匈奴“和亲”，反对反击匈奴。法家张湯則主张反击匈奴，罵他“愚蠢无知”。他很不服、汉武帝問他，和亲能使匈奴不入侵嗎？結果他哑口結舌。汉武帝便硬派他去守边防綫上的一个要塞，在那里仅一个多月就被匈奴杀死了。武帝用卫青霍去病坚决反击匈奴，霍去病曾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抗匈奴坚决打了四十年，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議，但这个建議并没有被真正采纳。汉武帝基本上是坚持法家路綫。当时汲黯就指出：“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效唐虞乎？”武帝大怒，变色罢朝，公卿都为汲黯担心。武帝退朝后对人說：“汲黯这个人实在太直戇了。”汉武帝“內修法度”，“以法制馭下”，他不顧儒生的干扰，任用的人主要是法家。

“用人唯才”，如原来是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为大司农，用奴隶出身的卫青和他的外甥霍去病为大将。对董仲舒并没有重用。他名义上尊儒，实际上尊法，儒家并没有成为正統的官方思想。但在当时，汉武帝的确也用了些儒生，使儒家的地位有所提高，他用儒生的目的是为了欺騙人民。因为到汉武帝时，我国的封建社会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銳，在这种情况下，反动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欺騙人民的手段，日益为地主阶级所重視了。这說明汉武帝时地主阶级

的地位是在从进步向保守轉化。但是，从主要方面看，汉武帝是个两汉时期很有作为的法家。

武帝死后，汉昭帝繼續执行法家路綫，对匈奴奴隶主貴族的侵扰，采取抵抗的方針；对于煮盐、冶鉄两项重要的手工业，仍坚持实行国家专卖政策。到汉宣帝时期法家路綫仍在貫徹。宣帝認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办事不能依靠这些人。当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向他的父亲汉宣帝建議“宜用儒生”。汉宣帝罵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为什么要純粹用儒家的德教，实行周朝的政治呢”

（《汉書，元帝紀》）并說：“破坏我家的，就是你这个敗家子了”（“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元帝是个彻头彻尾的儒家信徒，“及即位，征用儒生”（《汉書，元帝紀》），尊儒反法，儒家成为了正統的官方統治思想，汉朝的政治由盛到衰，元、成、哀、平四朝，一代不如一代。尊儒的結果，农民起义推翻了西汉王朝，汉王朝归于灭亡。到了东汉，封建統治繼續提倡孔学，尊儒反法，为了加强思想統治，东汉章帝于公元79年在白虎观召集儒生討論怎样解释經書。会上他們大肆宣揚董仲舒神秘主义“天人合一”的学說，对經書进行神秘主义的解釋，这叫做“讖緯”，“讖是神的予言”，緯是对孔老二的經書所作的迷信解說。讖緯迷信成为了当时封建統治者的国教。这就是两汉地主阶级統治者由尊法反儒向尊儒反法轉化的大致情景。

地主阶级統治者由尊法反儒轉化为尊儒反法的根本最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毛主席說：“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統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

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由尊法反儒向尊儒反法转化的过程就是地主阶级由革命转向反动，由先进转向落后的过程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西汉前期，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它执行法家路线，运用地主阶级的专政，镇压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打击地方分裂割据，抗拒外来侵略，这是有进步作用的。同时，这个阶级是一个剥削阶级，它同农民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在取得政权后不久，就由于秦王朝，特别是赵高篡权后的秦二世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以陈胜吴广为首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推翻了秦王朝。这就是说，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他们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是造成秦朝灭亡、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原因。同时，秦始皇死后，代表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宦官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秦朝的大权，改变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路线，使秦始皇政权变质，这也是秦朝很快就灭亡的重要原因。

陈胜吴广，是我国古代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第一次开展反孔斗争的英雄人物。他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斗争矛头直指秦二世为首的秦王朝，同时也是猛烈反孔斗争的主力军。秦王朝为了维持其统治，派贫苦农民去戍守边区，陈胜吴广当队长，途中是连天大雨，不能如期到达。按秦法，不能如期到指定地点者斩。陈胜吴广在这时激起了反抗的精神，响亮地提出：“如今逃亡是死，举大计（起义）也不过是死，同样是死，起义来得更好”，他

們還說：“誤了期是要殺頭的，就是不殺頭，去服那種苦役十有六七也要送命。男子漢大丈夫不死就罷，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那些帝王將相難道都是天生的貴種嗎”？陳勝响亮提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這是農民階級革命造反宣言，是批判孔老二不能“犯上作亂”的戰鬥號召，有力地批判了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批判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命論和“君權神授”的反動謬論，粉碎了孔孟所宣揚的一整套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的反革命復辟之道。這充分說明，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既是推翻秦王朝、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又是批判孔老二的主力軍。

由於農民起義推動了歷史前進，沉重地打擊了孔老二的儒家思想，這也就影響和推動了西漢前期的還處於上升時期的地主階級統治者法家路線的推行。西漢前期地主階級統治者，在農民鬥爭的推動下，同沒落奴隶主復辟勢力和地方諸侯王割據勢力以及外來侵略勢力作鬥爭。但是經過漢景帝鎮壓吳楚七國之亂，奴隶制復辟勢力和地方割據勢力遭到致命的打擊，一開始就存在的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武帝時農民起義蓬勃興起。“民多貧，盜賊眾”（《漢書·石奮傳》）。以後，封建統治者所面臨的任務，就是如何更加強對農民的統治和鎮壓。

地主階級逐漸從進步向保守和反動轉化。從此以後地主階級的保守派和反動派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加強對農民的專政，就逐漸不再需要革新，而需要守舊，安分守己了。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歷代封建統治者雖然實際上都採用了法家學說中主張中央集權制的地主階級專政的內容，但是，作為地主階級上升時期思想武器的法家思想，作為主張變革和進步的法家思想，就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地主階級政治的需要了，而儒家這個

沒落奴隶主階級的思想体系，却更有利于保守的反动的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需要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儒家那套反对任何变革、进步，主张复古、倒退，反对任何犯上作乱，主张安分守己、克己复礼的反动哲学，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作辯护。这还因为，法家比較暴露，赤裸裸地主张地主階級专政，階級面目很鮮明，而儒家，他們在进行残酷的反动鎮压的同时，还有很大的欺騙性。正如柳下跖痛罵孔老二指出的，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巧伪人”，是彻头彻尾的两面派，极端虛伪奸詐，有利于地主階級在进行反动暴力鎮压的同时，进行欺騙宣传，麻醉劳动人民的革命意识，征服人心。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沒落奴隶主階級和保守反动地主階級都是反动的剝削階級，本質是一致的，而儒家那套剝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維護等級制度的綱常名教，經過少加改造，完全符合反动統治階級的需要。董仲舒正是适应地主階級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这种階級需要，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个反动階級代表人物。他把本来是为沒落奴隶主階級服务的“孔孟之道”加以改变和发展，使它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2）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一生就是鼓吹孔老二的儒学、毒害劳动人民的反动的一生。他特別吹捧孔老二宣揚“克己复礼”的变天賬《春秋》。他竭力鼓吹《春秋》“大一統”的反动复古思想，要用孔老二的反动儒家思想来統治人民。他說：“老百姓頑强鬧事，犯上作乱，对于他們必須用‘教化’来‘隄防’。”孔孟之道就是防止人民造反的“隄防”。因此，他主张“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絕其道”。凡属不是孔老二儒术的，一律禁絕。这就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反动口号的

實質，就是禁止法家思想，定儒家于一尊。就是尊儒反法，反對秦始皇。他大罵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韓非和秦始皇，攻擊秦始皇“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咒罵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說什麼秦始皇“嚴厲禁止文化學術，不許藏書，拋棄禮義，連听也非常討厭听到它，他的心是想把先王之道消滅乾淨”。把秦始皇鎮壓奴隸主復辟的進步措施，執行法家的進步路線，說成是秦始皇的罪惡。他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說秦滅亡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實行法家政治的緣故。因此他反對漢武帝繼承秦王朝鞏固統一中央集權制度的法家路線，主張分封諸侯，叫嚷“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春秋繁露·玉英》），由諸侯統治自己的封地。他反對漢武帝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和防止匈奴入侵而採取的鹽鐵官營政策，主張“鹽鐵皆歸于民”（《漢書·食貨志》），實際是維護地方割據勢力和奴隸主殘余勢力。他反對漢武帝對匈奴的積極防禦政策，建議對匈奴“說（悅）以厚利，結之于天”（《漢書·匈奴傳》），多送給匈奴以物質財富，並且對天發誓，締結苟安和約，胡說這比備戰還要緊，無耻鼓吹妥協退讓，屈膝投降。他對漢武帝推行法家路線，重用法家人物極為不滿。當時，漢高祖的廟園曾失火，董仲舒便乘機誣蔑法家，說什麼這是因為漢朝繼承了秦的制度，引起了上天不滿而發出的警告，因此他建議應該大殺法家，才能平息天的怨恨，對法家有着刻骨的仇恨，必欲殺之而后快。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漢武帝把他逮捕起來，關進監獄。

董仲舒瘋狂吹捧孔老二，把孔老二供奉為通天的教主，把儒學奉為神秘的宗教，把它改變和發展為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統治的精神枷鎖。

董仲舒是怎樣改變和發展孔孟之道，使之適應保守、反動

的地主階級的需要呢？

1、董仲舒尊儒思想的核心，就是君權神授的天人感應目的論。他恢復和發展孔孟的天命論，宣稱“天”是超自然、超經驗、有意志、有人格的至高無上神，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是“天志”有目的地創造和安排的，陰陽、四時、五行、萬物和人類都是受“天志”的支配。天所以創造世界是為了人，而人所以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執行天的意志。符合天意的，天有賞；違反天意的，天必罰。他宣稱，皇帝是代表“天志”的絕對權威，天生就是為了統治勞動人民的，而勞動人民天生就必須服從皇帝的統治。他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舉賢良對策》）。就是說，封建專制統治法則來源于神，神是永恒不變的，封建專制統治法則也是永恒不變的，為封建專制統治的永恒性作論證。

2、董仲舒鼓吹先驗主義的認識論。他恢復和發展了孔孟的先驗主義的正名論，認為“名”（概念）不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是“天志”的表達。“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不是客觀事物決定名稱概念，相反的，人的名稱概念是天賦的，並且決定着客觀事物。在他看來，只有封建統治者的最高代表，叫做“聖王”的，有天生的非凡的神智，可以“前知千載，後知萬世”。“聖王”根據“天志”制定出“名”來，用以“教化”人民，具有壓倒一切、統治一切的絕對權威。他用這種地主階級的先知論即天才論，為地主階級的統治辯護。

3、董仲舒“名教”思想的主要之點是“三綱”“五常”。他把孔孟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發展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鼓吹君、父、夫對於臣、子、妻有絕對統治的權利，而臣、子、妻對於君、父、夫有絕對服從的義務。他把孔孟提倡的“仁、義、禮、智、

信”，叫做“五常”，即封建統治者进行統治的永恒不变的法則，用以作为巩固“三綱”的根本教条。他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認為三綱来[源]于神，用神权为三綱五常涂上神圣的光彩。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是董仲舒用以束縛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精神繩索。

4、董仲舒提倡先驗主义的人性論和道德观。他繼承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驗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天生就是“善”的，叫做“圣人之性”，这实际上是对大地主大貴族的階級性的神圣化；中等，可“善”可“惡”，必受“教化”才能“善”的，叫做“中人之性”，这实际上是对中小地主的階級性的称呼；下等，天生只能“惡”，不能“善”的，叫做“斗筭之性”，“斗筭”是卑小微賤的意思，这实际上是对农民階級性的誣蔑。他胡說“民”的意思就是“瞑”，恶毒地把劳动人民說成是天生下来就是瞑頑无知的。这种“性三品”說，是封建社会的階級划分在封建統治者头脑里的歪曲反映，其目的在于論証封建社会階級对立的天經地义。

由董仲舒定于一尊的孔孟之道，很适合于反动統治階級的需要，所以成为了历代反动統治階級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他所論証的三綱五常的名教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了系統的封建主义綱常名教的理論，并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是对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反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階級本質的深刻批判。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公开叫嚷：“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他的死党陈伯达帮腔附和，大肆鼓噪：“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由于他（董仲舒）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他们的反革命罪恶目的，就是要“罢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独尊孔孟之道，用以作为篡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和法家斗争的形势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这就是法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开始逐渐下降，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后，地位开始逐渐上升。到了元帝，儒家学说就成为了地主阶级统治者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正统思想。这中间经过了儒法两家的尖锐斗争。西汉昭帝时，桑弘羊舌战群儒，就是围绕这场尖锐斗争而展开的儒法两家的大论战。

桑弘羊舌战群儒

桑弘羊是西汉中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家和理财家，生于公元前152年，本是洛阳商人的儿子，13岁时就被提拔到汉武帝身边当助手（“侍中”）。先后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职，掌握全国最高财政大权达三十年之久，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击匈奴入侵的一系列最高国策，如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都是由他直接

参与制定并积极推行的。他是汉武帝法家政治路线的坚决捍卫者。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六年，即公元前八十一年，由于以大将军霍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和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阴谋反对汉武帝的法家政治路线，在他们的一手操纵下，把全国的儒生，即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包括有功名的“贤良”和没有功名的“文学”，共六十多人，召到首都长安，开了“盐铁会议”。围绕着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防御匈奴入侵的政治路线问题，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儒生代表着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和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操着同董仲舒一模一样的腔调，鼓吹复古，反对革新；鼓吹德治，反对法治；鼓吹分裂，反对统一；鼓吹投降，反对抗战。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全面否定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反对盐铁官营、防御匈奴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桑弘羊和他的部属们，代表着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以法家思想为武器，舌战群儒，力排众议，猛烈抨击孔孟之道，热烈赞扬秦始皇和法家，坚持和捍卫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力主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防御匈奴等政策，反对复古和倒退，坚持革新与进步；反对德治，坚持法治；反对分裂，坚持统一；反对投降，坚持抗战，表现出了法家朝气蓬勃的反潮流精神。《盐铁论》一书，就是西汉儒生桓宽根据这次论战的记录加以整理而成的。它带有浓厚的儒家倾向，但却生动地反映出了儒法两家的尖锐对立。

儒生们反对汉武帝法家政治路线的第一个理论根据就是宣扬复古倒退、反对前进革新的反动历史观。

他们捡起孔老二“克己复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破烂货，挥舞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破旗，鼓吹

“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的反动口号，公开叫嚷汉武帝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抗拒匈奴等国内外政策，是违反了“古之道”，是汉武帝的“过错”，他们要纠正汉武帝的“过错”，否定汉武帝的国内外政策，所以要复古。他们说，当皇帝的要效法三王，当丞相的要效法周公，制定统治人民的法术要效法孔老二，这是百世不能改变的道理（“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刑德》）。这就是要把夏、商、周的奴隶制度以及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周公、孔老二的思想，作为万古不变的规律，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大肆吹捧“成汤文武之功，”（《褒贤》），竭力鼓吹“周公之时”是太平“至治”的理想社会（《利议》），“阴阳调，风雨时，上不苛扰，下不烦劳”（《执务》），把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统治秩序，简直说成是人间的“天堂”。他们尊奉孔老二为祖师爷，以为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圣人”（《论儒》），公开宣扬孔老二“如有用我者，我就要在东方恢复周朝”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褒贤》）。在他们看来，虽然奴隶制度改变成了封建制度，但实质上它的剥削之道压迫之道是没有改变的，“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遵道》）。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们宣扬复古主义的阶级内容。按照他们这套复古主义的开倒车的逻辑，因循守旧就是天经地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他们对于任何革新和进步，对于主张革新的法家，从管仲、吴起、商鞅、韩非、秦始皇、李斯、杜周、张汤，一直到桑弘羊，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攻击，胡说管仲“设九府，徼山海”，由政府经营全国经济命脉，帮助齐桓公霸天下，是“其所务非也”（《轻重》），不是务圣人复古之道；胡说商鞅“无先王之法，非圣人之道”，所以就死“亡”了（《论诽》）；攻击